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

饒學卷



顧問／饒宗頤 李焯芬

主編／鄭焯明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

饒學卷

顧問／饒宗頤 李焯芬

主編／鄭煒明

編委會成員／鄭煒明 陳德好 羅慧 孫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週年館慶同人論文集. 饒學
卷 / 鄭焯明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325-7618-0

I. ①香… II. ①鄭… III. ①饒宗頤—人物研究—文
集 IV. ①K825.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83079 號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週年
館慶同人論文集——饒學卷

鄭焯明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635 × 965 1/16 印張 22.5 插頁 2 字數 282,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050

ISBN 978-7-5325-7618-0

K · 2034 定價: 8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總序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於 2003 年 9 月開始運作，至 2013 年的秋天，已滿十周年了。時間過得真的很快，由剛開始時連我在內的四位同事，發展到今天的共十六七位全職或兼職的同人，另還有十餘位名譽研究員，規模明顯大了不少。但一切都恍如昨日。

十年如一日，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秉承饒先生的志向，一直把他所提倡的華學的學術研究，作為工作重點之一。十年來，一群年輕而有活力的青年學者，在學術部主任鄭煒明博士帶領下，孜孜不倦地在好幾個領域努力不懈地學習和研究，也總算做了一點點成績出來。現在呈獻的這一套“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分敦煌學卷、琴學卷和饒學卷三種，收錄（去除了重見的）論文共四十餘篇，展現了學術館的部分成果。這三部論文集約有兩個特點：一、論文的選題都比較新，並非老生常談的題目，具見一群年輕人有著努力鑽研學問，開辟新領域的學術進取心；二、論文的作者除了鄭煒明博士外，都比較年輕，有七零後的和八零後的，都可算是學界新人，這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學術和文化正需要一代代的傳承。

當然，學術館同人在過去十年曾耕耘過的學術領域，不止這三部論文集的範圍。他們的個人項目中還包括考古學、人類學、詞學、文獻學、歷史學等等方面的課題，都有一些可觀的成果。饒先生一直非常鼓勵學者要具備跨領域、跨文化的學術能力和表現，而學術館的同人在這方面都很有潛力，這三部論文集就是一個小小的證明。（也因為這個緣故，三集之中有小部分重見的論文，這是要說明的。）

總之，我對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的同人，充滿信心；謹祝願大家在新的十年更進一步，在學術上有更多的建樹，而學術館也因此而發展得更好。

是為序。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

李焯芬

編者前言

饒宗頤教授，字伯濂，又字選堂，號固庵。是蜚聲國際的百科全書式大學者，在歷史、文學、語言文字、宗教、哲學、藝術、中外文化關係等人文科學領域中，皆有卓越的成就和突出的貢獻。更兼擅文學、書畫、古琴等，可謂文、藝、學三者兼備，堪稱“一身而兼三絕”，實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巨擘。饒教授成就之博大精深，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是為饒學，亦是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

2003年，饒宗頤教授將其四萬餘冊藏書及二百件書畫作品贈送給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因此成立。創館十年來，港大饒館同人以饒教授治學精神為榜樣，在文史哲藝各研究領域，均有可觀成果；與此同時，亦為饒學研究及推廣之先驅。本書即彙集建館以來各成員所著饒學論文十數篇，分別探討饒教授的學術思想，以及他在文學、琴學、敦煌學、藏學、歷史考據學、藝術等多個領域的卓越成就，同時注重考證饒教授與當代學者的來往互動，更從側面反映了這位偉大學者在現代學術史中的地位和風采。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二〇一五年一月

目 錄

總序 /1

編者前言 /1

論饒宗頤先生的華學觀 鄭煒明 /1

選堂字考

——兼及先生名、字、號的其他問題 鄭煒明 陳玉瑩 /16

選堂先生軼事數則 鄭煒明 /41

饒鏗先生的潮州方志學初探 鄭煒明 陳玉瑩 /48

饒宗頤先生的琴學初探 龔敏 /69

饒宗頤教授的敦煌文學研究 黃杰華 /95

饒宗頤教授與藏學研究 黃杰華 /133

椎輪爲大輅之始：論饒宗頤先生與歷史考據學 胡孝忠 /166

饒宗頤與顧頡剛交誼考述 胡孝忠 /186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The Art of Jao Tsung-i Maria Cheng (鄭寶旋) Tang Waihung

(鄧偉雄) /220

別開天地

——對饒宗頤教授近年繪畫創作的一些看法 鄧偉雄 /253

饒宗頤教授彩筆下的金銀世界 黃兆漢 /259

饒宗頤教授與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 羅慧 /287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饒宗頤教授資料庫暨饒學研究中心藏“《江南春集》檔案”初探 羅慧 孫沁 /309

附錄

饒宗頤《輓季羨林先生 [用杜甫長沙送李十一(銜)韻]》補記 鄭煒明 /327

丹青不老

——選堂先生九五華誕紀事 李焯芬 /330

記饒宗頤先生九五華誕研討會

——兼略述饒氏敦煌學成就 鄭煒明 /334

饒宗頤教授學藝年表(1917—2013) 鄭煒明 鄧偉雄 /341

編後記 /349

作者簡介 /352

論饒宗頤先生的華學觀^①

鄭煒明

一、引言：華學與關聯主義的國學

饒宗頤先生，字伯濂，又字選堂，號固庵，1917 年出生於廣東省潮安縣（今潮州市），長期從事學術研究及教學工作，治學範圍廣博，蓋可歸納為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包括潮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 13 大門類，已出版專著 70 多種，發表學術論文 500 多篇，亦擅書法、繪事及舊體文學創作，並諳操縵，刊行的舊體文學作品集有 10 餘種，書畫集 40 餘種，可謂學藝雙攜。此外，先生亦精通中國古代文獻及多種外語，研究着重史料考證，且不斷創

^①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曾參考鄭煒明、林愷欣合著之未刊論文《饒宗頤先生學術歷程及其成就概述》。該文將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為饒先生舉辦過的一個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刊出。

新，在多個學術領域皆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國際漢學界獲得高度評價，迴響極大，對於海內外推動漢學研究及弘揚中華文化貢獻至鉅。

對於國學一詞，饒先生並不常常提及。近年來，中外學術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都常常稱他為一代國學大師，他也就祇好採取一種默認的態度了。據筆者粗淺的理解，所謂國學，有兩大點：一是範疇的問題，二是方法的問題。以我所知，饒師他是主張用華學一詞的。1994年2月他為自己創辦並主編的《華學》這份大型國際學術刊物寫發刊辭時，就曾這樣說過：

中華文明是屹立大地上一個從未間斷的文化綜合體……中國何以能夠維持七八千年的綿延不斷的歷史文化，光這一點，已是耐人尋味而不容易解答的課題。

從洋務運動以來，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已失去信心，外來的衝擊，使得許多知識分子不惜放棄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馳騁，久已深深動搖了國本。“知彼”的工作還沒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卻甘自拋擲。現在是返求諸己、回頭是岸的時候了。

（略）

我們所欲揭櫫的華學趨向，有下列三個方面：一是縱的時間方面，探討歷史上重要的突出事件，尋求它的產生、銜接的先後層次，加以疏通整理。二是橫的空間方面，注意不同地區的文化單元，考察其交流、傳播、互相挹注的歷史事實。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錯綜方面，找尋出它們的條理——因果關係。我一向所採用的史學方法，是重視“三點”，即掌握焦點、抓緊重點、發揮特點，尤其特別用力於關聯性一層。因為唯有這樣做，纔能夠說明問題而取得較深入的理解。Assyrian 文法上的關係名詞（Relative Pronoun）有一個（Sa）字，具有 Whom、What

等意義，我在史學是主張關聯主義的，我所採用的，可說是一種“Sa”字觀，有如佛家的阿字觀。我願意提出這一不成熟的方法論點，來向大家求教。

(下略)^①

從饒宗頤先生的夫子自道，筆者幾乎可以肯定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謂國學，即饒師心目中的知己功夫、返求諸己的傳統中國文化之學，但他認為這是研究中華文明這個屹立於大地之上一個從未間斷的文化綜合體的學問，所以他會稱之為華學。筆者相信，饒師不會反對華學即國學這一說法。饒師在講了華學的範疇之外，也談及了他所主張的方法論：史學上的關聯主義。他一向認為一切文化領域的研究，皆文化史範疇的研究，故必須具備史學的角度。他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上的史學的關聯主義（Sa字觀、阿字觀）等等，以及所謂在研究時所採的縱、橫和交叉錯綜等切入角度和坐標，其實最終皆可總結為文化的關聯性研究。因此，筆者認為大可以將之稱為饒氏的關聯主義國學。至於文化的關聯性，指的是文化源流的複雜性和多元化，這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內涵及其條理和因果等關係，正是饒師最有興趣、認為最值得探索的。而這些特點，也許可以被視為饒宗頤先生的國學新視野。

上述種種，乃饒師在華學方面所提倡的新視野，其實卻是他經歷了60年以上研究中華文明的深刻體會和積累後的一個大綱。筆者認為又可將饒師的治學特點再細分為下列第二、三和四部分的三大項。

^① 饒宗頤：《華學·發刊辭》，見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一期，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二、留意新發現之研究資料、開闢新課題， 或新化、深化舊課題，並且持續探索

饒宗頤先生在華學研究方面，以擅於發掘和開闢前人未加注意或重視的新課題見稱，但他對某些課題的堅持和持續探索，卻是更值得我們借鏡的。

饒宗頤先生是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第一人，其於 1956 年出版的《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倫敦所藏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並考定了《想爾注》成於張魯之手而托始於張陵，對道教史研究有重要意義。是書出版後引起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道教研究熱，陳世驥、楊聯陞、嚴靈峰、陳文華，還有日本大淵忍爾等諸位學者紛紛撰文討論。此書在國際學術界負有盛譽，法國漢學家康德謨先生（M. Kaltenmark）選此作為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的道教史教材；饒先生的學生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荷蘭漢學家）曾撰文闡釋此著在世界道學發展史上的意義：

前此無人敢將早期的道書當成一項專門的研究主題。……饒先生是道教研究的開拓者。他不僅把蒙塵已久的重要文獻搶救出來，並加以各種嚴謹的註釋和考證。可以說，在他之前，從未有人如此科學地研究道教文獻。……饒宗頤先生的成就使法國學者（康德謨、戴明維、史泰安等）非常佩服。《老子想爾注》為他們提供了一個了解漢代思想的全新角度。^①

^① 施舟人：《饒宗頤先生的〈老子想爾注〉研究和世界道教學的發展》，載曾憲通主編：《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第 1 至 4 頁。

在探討學術問題方面，饒先生有着一種求實求真和堅毅不撓的精神特質，能持續不斷地鑽研和發掘新問題。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老子想爾注校證》，便是在原著《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的基礎上，再增收了先生對此課題的新的研究成果。一個課題，研究、修正、增訂前後達三四十年，這種情況，在饒師來說，絕非孤例。

又如1992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詞集考》，實則是在1963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之《詞籍考》的基礎上修訂增補而成，為學術史上第一部以目錄學和版本學研究詞學的著作，其研究方法與角度，為詞學研究提供了豐實的研究資料與基礎。饒師此書，也證明了許多時候，最舊、最傳統的研究方法，其實一樣可以開創學術史上的新課題。

1959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甲骨學著作《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全書1300多頁，共80多萬字，是饒先生以20年心力，利用當時所能見到所有的出土甲骨資料，^①全面而系統地研究殷商時代貞卜人物的專著。先生開創了以貞人為綱、排比卜辭的先河，在理論和方法上均超越前人，對了解各個貞人的占卜內容及其所屬的時代很有參考價值；更有學者認為這是一部早期商代社會原始資料最基本的綜合研究著作。^②此著出版後獲中外學術界高度重視，共有13國文字書評予以介紹；1962年，饒宗頤先生更因此書而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頒授的“漢學儒林特賞”，學術成就得到國際漢學界的認同。後來，韓國學者孫睿徹更以十年時間，將此著翻譯成韓文本於1996

^① 據劉釗先生記述，《通考》一書共徵引甲骨著錄書58種，囊括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全部素材，還引用了7種未曾刊布的甲骨材料，可謂窮盡材料，極其難得。參見劉釗：《談饒宗頤教授在甲骨學研究上的貢獻》，載曾憲通主編：《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3至29頁。

^② 沈建華：《記饒宗頤甲骨文研究》，《上海社會科學報》第311期，1992年6月11日；又見於鄭煒明編：《論饒宗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第107至109頁。

年出版。^①但饒師並沒有因此而自滿，他其後繼續研究甲骨學，主編有《甲骨文通檢》（共五冊，1989—1999年）等作品。

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饒先生曾赴日本、韓國、英國、法國等地從事研究。1963年，先生應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之邀，赴天竺作學術研究，成為該所永久會員，並跟隨白春暉先生（V. V. Paranjpe）父子^②二人學習婆羅門經典，曾深入鑽研《梨俱吠陀》等圍陀經典，更兼遊天竺南北各古地。饒先生後來從事“東方學”研究，其梵學知識便植根於此，著作豐贍，而其中悉曇學更是獨繼絕學，成就過人；相關論文後結集為《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語文篇——悉曇學緒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香港三聯書店，1990年）和《梵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前者更是既補充了王力等先生們在漢語史和古漢語研究方面的缺漏，又揭示了中印兩個民族在語言文化方面的關係的一部極為重要的學術著作，堪稱絕學，可惜至今尚未獲得足夠的重視。

1976年，饒先生第三次往法京巴黎，在遠東學院工作之餘，又追隨蒲德侯（Jean Bottero）學習巴比倫文，開始研究上古楔形文字和西亞上古文獻，後以多年時間將一部以楔形文字記述阿克得人開天闢地的世界現存最早的史詩，翻譯成中文，在1991年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近東開闢史詩》，成為巴比倫史詩之第一部中譯本。^③

從1978年起，饒宗頤先生的研究可謂碩果纍纍，先後編著書刊

① 饒宗頤：《韓譯本〈殷代貞卜人物通考〉著者序》，載饒宗頤著，孫睿微譯：《殷代貞卜人物通考》I-III，漢城，1996年。

② 白春暉為印度資深外交家、古梵文學者；據饒宗頤先生記述，白春暉曾留學於北京大學，1954年尼赫魯訪華期間，曾任翻譯；在香港期間白春暉曾任印度駐港領事館一等秘書，並與饒先生互換梵漢語文知識。詳見林在勇主編，饒宗頤述，胡曉明、李瑞明整理：《饒宗頤學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至60頁。

③ 此著之簡體版於1998年出版，饒宗頤編譯：《近東開闢史詩》，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數十部，舉其要者，如《雲夢秦簡日書研究》（1982年）、《楚帛書》（1985年）、《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與曾憲通合著，1993年）、《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等等皆屬新出土簡帛之學；主編《補資治通鑑史料長編稿系列》（1995—2004年）乃據新出土史料以補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1998年）是一部以全新角度審視漢字的族源，涉及中外多個古民族、多種古文字，實則上已是一部上古文化交流史和比較上古文字史學，其重要性已有多位著名學者撰文推介。

饒師早年曾追隨顧頡剛先生，治上古史地，並曾主編《古史辨》第八冊，後因戰事而未刊。但他對考古、上古史地的研究其實是貫穿他一生的。一直到新世紀，他還出版了《古史之斷代與編年》（2003年）、《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金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後者更體現了饒先生對上古史地研究的一貫性，他以極為深厚的古文獻功力，結合考古出土的新材料，再參考外國古文化中的相關資料，然後作文化史的關聯性研究，得出許多新知灼見，足堪垂範後學。

從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一位並不強調專門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他強調的是要打通；筆者記得饒師曾經教導說：“文科不同於理科，過分強調專家、專門，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無家可歸’。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個領域，要文史不分家，其實是要文史哲藝統統都不分家。”^① 他重視考古新發現、新出土的材料，他有著堅實的古文獻知識，他關注外國同時期、同範疇、同類型的資料，他相信文化間充滿著關聯性，

^① 據筆者札錄饒師1982年9月為澳門東亞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韻文班上學生講課時第一講的筆記。

所以在他的研究裏，觀點絕不守舊，處處閃爍出新的視角。

三、從“三重證據法”到“五重證據法”—— 拓展和建構考證方法與理論的多維空間

總括其學術歷程，饒先生早年以攻治地方文獻及中國上古史地為主，中年以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地下出土文獻，壯年則由中國古代的研究擴展到人類文化史的研究，興趣逐漸移到印度至西亞，而新世紀時又回歸到上古史地。由於先生精通中國傳統文獻，史學根基深厚，又長期研治甲骨文、金文和戰國秦漢文字，並通曉英、日、德、法等國語言及印度與巴比倫古代文字，研究問題能旁徵博引，突破地域與學術門類的界限，並常能着人先鞭，發掘新問題，提出原創性的命題與立論，在多個學術領域皆有重要建樹。

但作為一個劃時代的大學者，有沒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研究方法論，也是能否獲得認同和肯定的關鍵要素之一。饒先生就是一位有自己的方法論的學者。

上世紀20年代，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總論》提出“二重證據法”：“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新材料，我輩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①王氏主張運用“地下之新材料”，以印證古文獻記載的資料，着重以二重證據互證，為考證學奠下新法，對傳統學術研究進行了改造與革新，為上世紀史學的研究帶來巨大

^①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至2頁。

的影響。

過去數十年間，大量的文物與文獻相繼出土，面對這些豐富的史料，饒宗頤先生認為研究者應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以縝密的方法與角度，對新出土文獻進行研究，結合傳統與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這些珍貴的資料。1982年，先生在“香港夏文化探討會”上，首次提出以“三重證據法”研究夏文化，認為“探索夏文化，必須將田野考古、文獻記載和甲骨文的研究三方面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互相抉發和證明”。^①中山大學曾憲通教授對“三重證據法”作了詳細的詮釋，指出饒先生創新之點，是把有文字的出土新材料與沒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區隔開來，並特別強調“有文字材料”的重要性。^②此考證法廣為古史研究學界的專家學者所認同。

數年前，饒宗頤先生在《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一“史溯”的開篇《論古史的重建》中，進一步闡述“三重證據法”的要旨：“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較王靜安增加一種者，因文物的器物本身，與文物之文字記錄，宜分別處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記錄，其為直接史料，價值更高，尤應強調它的重要性。”此外，更提出史學研究必須採取的三種途徑：一是儘量運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記錄，作為我們所說的三重證據的主要依據；二是充分利用各地區新出土的文物，詳細考察其歷史背景，做深入的探究；三是在可能範圍下，使用同時代的其他古國的同時期事物進行比較研究，經過互相比勘之後，取得同樣事物在不同空間的一種新的認識與理解。^③

① 原文為饒先生在1982年5月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之“香港夏文化探討會”上致詞內容；又見饒宗頤：《談三重證據法——十干與立主》，《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年，第12至18頁。

② 曾憲通：《選堂先生“三重證據法”淺析》，載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九、十輯合刊（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至38頁。

③ 饒宗頤：《論古史的重建》，《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一，2003年，第7至11頁。